1931年

9月18日　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首先占领我国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的既定方针，先后制造了一系列的挑衅事件。早在1930年冬，日本关东军就选定以柳条湖村作为制造武装侵略事件的地点。1931年7月，日本间谍机关在东北边境泡制了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日本政府借口有一个日本军官中村在东北失踪，调集大批军队密布于沈阳一带，加紧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准备。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由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按照关东军本庄繁的密令，在柳条湖附近距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约800米的地方炸毁了一小段铁轨。日本关东军反诬中国驻军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随即开始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命令各部队向沈阳集结兵力，发动进攻。而国民党南京当局却电示东北中国军政当局,命令军队“切勿妄动,以免误会”。蒋介石亦多次致电在北平的张学良“不准抵抗”“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东北军奉命“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对此,爱国士兵极为愤慨“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10万余东北军不战而退，大片国土很快沦陷。

9月19日　日本侵略军侵占沈阳、长春、鞍山、抚顺等十余座城市。是日，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到沈阳。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工农民众立即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阳事件照会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同时电令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入侵东北真相，请国联主持公道。当天，施肇基向国际联盟大会报告日军侵占沈阳情况，日本代表芳泽打断施发言，宣读“满洲事件”声明，称“沈阳事件”是“地方事件”，要求国联不必过分重视。芳泽发言后，施声明：“中国保留解决关于此事之权利”。是日夜，中国代表团就“沈阳事件”发表宣言，指出日军对此事应负完全责任。张学良电告国民政府并通电全国，报告日军占领沈阳情形，略称已严令沈阳近郊各部“力持镇静，不得抵抗”。全国人民对日军入侵沈阳义愤填膺。北平各大学立即组成抗日救国会。全国各报均揭露日军入侵罪行。上海市商会、各同业公会等分别发出通告、通电、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广州古应芬等要员及全国同胞：“请息内争，共抗外敌”，以救危亡。

9月 20 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一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9月 20 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常委会议，讨论日军侵占沈阳事件，作出三项决议：一、电粤方对外交表示态度；二、定本月 23 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对沈阳被陷表示哀悼；三、推定戴季陶、邵元冲、陈布雷、王正廷、陈立夫起草《告全国国民书》及《告各国国民书》。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军侵略东北事向日政府提出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宋哲元、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沈克、马法五等原西北军将领及所部全体官兵通电全国，要求统一全国意志，集合全国实力一致抗日，表示“宁为战死

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商震、高桂滋也分别电张学良、蒋介石,愿率部抗日。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和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

9月21日　　日本驻朝鲜第三十九旅团渡过鸭绿江，侵入辽宁、吉林,一周内,辽宁、吉林两省基本丢失。接着,日本侵略军于1932年1月3日侵占锦州,2月5日侵占哈尔滨。至此,我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东北的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被屠杀。事变中，中国官方损失达178亿元，仅沈阳兵工厂就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多门,各种子弹300多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多架飞机全部被日军掠取，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穗等地的学生纷纷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但蒋介石至11月30日还发表演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并继续“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

9月22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决议号召全党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的任务。决议要求广大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9月22日　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题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声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并要求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大会决议:一、通电全国各军政领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二、呈请中央即日宣布对日绝交,准备作战;三、通电全国民众总动员;四、急电中央并张学良转东北全体官兵誓为抗日保国而战;五、通电全国对日永远经济绝交。同日,国际联盟理事会讨论"东北事变",要求日本撤兵。但日本不予理睬。

9月23日　南京国民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声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9月23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强暴之举,非为国际法规约章所不许,实亦世界历史之创闻,我国家遭此无比之奇辱,民族受此重大之侵凌,凡有血气,莫不骇愤。它表示"中央必以最善之努力,挽此未有之危局。深信公理尚未沦丧,强暴必受制裁;吾同胞各有宁为玉碎之决定,至最后必要时机,必能为国家民族洒最后热血。"它要求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在捍卫民族利益的原则下:"切戒一切阶级区域乃至见解情态分岐;保持坚定沉着,确定一切秩序,无时无刻不作牺牲之准备;全国工商学各界加倍努力,以坚定的意志,严格的纪律和必死的决心,作持久奋斗,救国御侮。"

9月3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揭露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对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阻挠和破坏,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罢工、罢课、罢操、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宣言》不顾"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治形势的新变化,继续坚持"左"的立场,强调

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打倒国民党，必须“反对一切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集团与派别”,如‘第三党’。

9月　以秦邦宪(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党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但它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一个极重要的步骤，而认为“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序幕”；它不提“保卫祖国”‘收复失地’的口号,而提‘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它不承认‘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和国内阶级矛盾逐步发生了新变化的事实，而错误地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与其进行‘决死斗争’,它所讲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统一战线，也就是按当时共产国际的口径所说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

10月初　上海80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派出代表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组织义勇军，发给枪械对日作战。

10月10日　正在江西‘剿共’的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在赣州体育场举行阅兵，该军将领蔡廷锴发表训话，反对打内战,主张团结抗日,勖勉将士要‘与国俱存,与国俱亡,死要死在国亡之前’。

10月12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宣言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广州政府和北平政府对于人民反日运动的压迫与屠杀，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而斗争。

10月12日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谈话。谈话说:日军虽然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我国仍要镇静持重,拥护公理以抗御强权:“我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

10 月 21 日　　马占山在齐齐哈尔正式就任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并发表通电“：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心全力铲除之”。同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在致国联主席白里安备忘录中重申：一、解决满洲纠纷之谈判，必须以日军立即撤退为基础。二、日军撤退时及撤退后，必须有一中立委员团视察。三、必须承认中国因日军侵犯满洲所受损失有要求赔偿之权。四、必须成立一中日之间调和与公断的永久机关。

10 月 23 日　　南京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出禁止排日法令。

10 月 27 日　　日陆军大佐土肥原贤二由沈阳赴天津，秘密进行挟持溥仪活动。其计划是：破坏华北政权，若成功即扶植溥仪在北平建立朝廷，将东三省让给日本，若扰乱不成功，则将溥仪挟持到沈阳作伪满洲国傀儡。

10 月　　蒋介石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他还亲自书写一份手令说“：倭寇深入，赤匪狡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这就是说，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才是抗日来攘外”。蒋介石曾向部下宣布‘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成了国民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一个基本准则。

11 月 4 日　　日军第十六联队、嫩江支队等在日机配合下，于当天拂晓开始向马占山部嫩江桥阵地发起进攻，守军奋起抵抗，拉开了江桥战幕。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给侵略者以重大杀伤。头 7 天就毙伤日伪军 1460 余人。后日军增兵至 7000 余人，并配以飞机、坦克协同作战，而马部只有 3 个团兵力，除伤亡外，所余不过 2000 余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马占山被迫于 19 日率部

撤离齐齐哈尔。历时 16 天的江桥抗战结束。

11 月 6 日　　苏联《真理报》刊登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节发表的《告各国工人、告资本主义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书》，谴责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备战和侵略活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帮助中国兄弟反对日本侵略，反对祸国殃民的国民党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告各国工人、告资本主义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书》中指出，“帝国主义者为了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事实上已在东方开始了战争。……侵占满洲——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而是“对我们的战争”，“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一步指出：“欧美的资本家正在用火车、轮船把武器、弹药和毒气运往日本，这不仅是为了对华战争，而且是为了对苏战争”，“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基于这种认识，共产国际反复强调要“武装保卫苏联”，认为“所有共产党的最重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工农与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以保卫中国和中国革命，保卫各国工人的祖国——苏联”；一再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世界各国工人和劳动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阴谋”。

11 月 7 日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苏区瑞金叶坪召开，正式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同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 11 月至 1932 年 6 月，红四方面军运用围点打援、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战术，连续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个战役，粉碎了国民党方面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 45000 余人。

11 月 9 日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第二次临时全会开幕，会

期 3 天。在给即将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提案中，只字不提抗日,却声言要继续用兵‘剿匪”,继续推行禁止传播所谓‘危害国家，破坏民族利益之反动文字或刊物”。11 月 12 日,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23 日闭幕。会议发表的《对全世界宣言》表示‘本大会坚决主张国民政府应速准备实力收回东三省，保障中国领土之完整,勿令其有丝毫损失”。会议通过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鼓吹‘戡平赤匪’的错误方针。这次会议还通过了蒋介石亲自北上，首赴国难案及奖慰马占山及黑龙江将士案。会议还作出决议“:剿灭匪共案,再交审查。”

11 月 27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布本政府“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为屠杀而借用的外债”。本政府的‘最后目的,不但在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在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

11 月 27 日　　蒋介石在被迫接见上海各大学请愿学生时表示“: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收复,当杀蒋某人以谢天下”。

11 月 30 日　　蒋介石发表演说,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胜于外者。’在所谓‘先安内’的方针下，蒋介石一方面指挥几十万大军不去打日本侵略者，而赴内地“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指令军警镇压抗日爱国运动。

12 月 5 日　　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 300 余人在南京由中央大学出发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沿途高呼“反对政策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一人被打死,33 人受重伤,185 人被逮捕。一部分学生跑回中央大学，军警亦追至中大与中大学生冲突,中大学生 1000 余人到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交涉代表亦遭到扣留，大队学生冲进司令部大门。

12 月上旬　朱德主持召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议，讨论和研

究驻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具体方案，决定派刘伯坚、左权和王稼祥具体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

12 月 11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和谴责国民政府出卖民族利益承认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等罪行，号召全国民众要组织和武装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同时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12 月 14 日　　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和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的推动下，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约 17000 余人,由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及黄中岳等率领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 3 个军的政治委员。宁都起义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震动了坚持内战、不愿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反映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

12 月 14 日　　北平、南京、上海、济南、天津、苏州、杭州、安庆等地学生四千余人从南京中央大学出发，前往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派徐秘书长出面应付。

12 月 15 日　　在全国抗日反蒋怒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但暗中仍掌握着南京大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推选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12 月 19 日　　宋庆龄在《申报》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 自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先后背叛了革命政策，并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成为帝国主义镇

压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其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宁粤对峙,并各自美名标榜,实则两者同为革命之罪人。因此,“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宋庆龄指出:我不忍见孙中山 40 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宋庆龄宣布,对国民党的灭亡不必惋惜,并相信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她表示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他们将奋起斗争,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前进。

12 月 22 日至 29 日　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宁、粤、沪三方中央执行、监察委员 109 人共同参加会议,宣告国民党的“统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政治改革案》和《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只代表国家,不负实际责任,且不兼他职;行政院只对国民政府委员负责。会议还对国民党中央构成作出规定,原中央各部改成委员会,并增设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改进党务案》、《树立党的中心干部以建筑党重心案》、《民众运动方案》、《召开国难会议、国民救国会议,缩短训政,实现宪政案》及压缩军备、实行征兵制等一系列决议。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推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叶楚伧、居正、顾孟余、孙科、陈果夫、于右任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会决定设立中央政治会议,不专设主席,设三人常委轮流任主席,并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会议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兼代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会议承认宁粤沪三方选出的中执、监委,确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72 人,

中央监察委员 24 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60 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22 人。

12 月 24 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在瑞金县叶坪召开庆祝红五军团成立并欢迎军团全体指战员和其他红军一起，站在同一条革命战线上，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

12 月 28 日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大会宣言，坚持其对内压迫对外退让的政策。这个宣言宣称“心腹之患，胜于外敌”,决定拨定军费、集中兵力,“继续努力肃清‘赤匪’,以安定社会秩序。”

12 月 29 日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指出：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指示要求反复宣传“只有苏维埃中国与中国红军才能够保证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及统一中国”。指示强调，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12 月 30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布《为孙连仲部第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号召全国被压迫的兵士们,“哗变到红军中去!打倒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2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中国民众在争取中国革命在几个省份的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必须更坚决的组织罢工、罢课、罢操，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游击战争，灾民骚扰，兵士哗变，更普遍更大规模的自动武装起来，加入中国红军的队伍内，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与反国民党的国内战争”。

1 月 5 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揭露并谴责国民政府对日侵略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动民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造成全中国民族奇耻大辱的国民党！’‘争取中国的统一与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1 月 9 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强调‘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努力求得‘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决议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1 月 23 日　　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汪、蒋仍主张‘先行安内，方可攘外’。

1 月 27 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共中央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苏维

埃旗帜之下武装保卫中国革命”。

1月2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第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开始了上海抗战。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运输队、救护队协助作战，并捐献了大量物资。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激于民族义愤，也参加了作战。全国各地人民也用各种形式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军民在一个多月的抗战中，顽强的抗击了日寇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日军万余人，迫使其四次更换指挥，粉碎了日寇用4个小时占领上海的迷梦。但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不仅不援助上海抗战，还阻止第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的抗战。3月1日，第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5月5日，国民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日本军队可在上述地区暂驻“若干军队”。5月6日，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当局出卖上海，反对对日屈辱协定。5月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5月2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调第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

1月30日　　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并于当日颁布迁移洛阳办公宣言。宣言叙述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呼吁国际强国干预日军的侵略，强调因上海战事威胁到南京的安全，“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决定迁都洛阳办公，望我各省区行政长官及军队长官，同心协力，各尽所职，以靖地方，而安人民”。国民政府除留下何应钦维持治安，罗文干主持外交，其余100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均迁往洛阳。因行事匆促，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占据了河洛图书馆，行政院及中央政治会挤进了职业学校。同年3月，由汪精卫主持，在洛阳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国民政府接着又决定以西安为陪都，洛阳为行都。《淞

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战事宣告结束，同年 12 月 1 日，国民政府又从洛阳迁回南京。

2 月 1 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总同盟罢工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压迫”。

2 月 2 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舰轰击南京各要塞事，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同日，上海日舰队炮击吴淞区。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奉最高当局命令“不准还击”。

2 月 11 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派坚强的工人队伍到军队中去争取士兵群众，要在工人、兵士、学生、城市贫民的斗争基础上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个指示还认为这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该起来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2 月 14 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军进攻上海告十九路军士兵书》，赞扬第十九路军士兵奋起抗日的英勇行为；揭露蒋介石出卖上海和中国的阴谋；号召第十九路军士兵和工农群众密切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

2 月 15 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遇到了十九路军士兵的英勇抵抗”揭露蒋介石派军队“监视十九路军，准备解除十九路军士兵的武装，以停止反日战争”的投降行径。该信认为“在反帝与反国民党的旗帜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这仍旧是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2 月 26 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决议指出：“‘一·二八’事变是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的手里。”决议认为，国民党将领领导的反日

战争是“利用士兵与民众的反日斗争，欺骗革命的兵士与革命的民众”；“是目前反日战争中最大的危险！”决议提出应成立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并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其他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成立民众政府。

3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八次常委会决议，正式宣布对日作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3月1日　中国国民党四届二次中央全会在洛阳开幕，3月6日闭幕。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方今之急，首曰御侮，同时“绥靖剿匪，所以巩固后方，昭苏民厄，亦不容忽视”。全会一方面致电慰劳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参加淞沪抗日将士“抵御强暴”的苦战精神，又一方面通过决议要制定“防范赤匪及其他反动分子”的工作实施方案。汪精卫在闭幕词中也说要对外抵抗日本，对内“肃清共党”。

3月9日“满洲国”在长春宣布成立，溥仪就任伪执政，发表“满洲国”成立宣言，定伪年号为大同。翌日，溥仪根据日方所提名单，任命伪政府官员。

3月11日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否认伪满洲国。同日，国民政府还发表中日间关于东北事变往来牒文。

3月12日　日本内阁会议发表《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坚持侵略扩张政策。日本政府提出“满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同时，它还提出要增加满洲驻军。

3月13日　蒋介石对路透社发表谈话：“东北成立伪国，完全为日方一手包办，政府痛恨溥仪甘当傀儡，但如讨伐，则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发讨伐令”。

3月14日　淞沪抗战正在紧张进行，蒋介石却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6月9日，《上海停战协定》签

订刚一个月,蒋介石就在庐山召集赣、湘、鄂、豫、皖‘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国策,并提出了‘标本兼治’的‘剿共”方针和第四次‘围剿’的计划。6 月 28 日,蒋介石在汉口成立‘剿共’总部,并自任总司令,准备调集 63 万兵力,拨出 3500 万元巨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

4 月 15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同时发出《为对日宣战告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及《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对于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企图消灭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并以此转移国内视线,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指出:“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义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提出要‘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表明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抗日的决心。通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训令指出‘积极发展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的部队,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的统治,正是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前提”。训令要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红军各级政治部、各县赤卫队部、应对全体红军战士进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和宣传,“激励起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情与勇气”;要求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对广大群众进行对日宣战的宣传和动员,使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并积极扩大红军力量,准备同日本侵略者作战。同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发出《关于 红五月运 动中实行 对日宣战的动员决议》,号召‘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站在苏维埃领导之下，一致的对日作战，首先便是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 ——国民党军阀及其统治。 ”

5 月上旬　国民政府积极部署“ 剿共 ”。5 月 1 日,何应钦到达南昌,部署闽粤赣三省‘ 剿共 ’事宜。国民党第四军张发奎部由醴陵出发赴赣‘ 剿共 ”。2 日,陈济棠在广州召开滇、黔、湘、桂、、闽、赣等 8 省军事反共会议。

5 月 9 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号召群众进行民族战争来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5 月 10 日　　鄂绥署主任何成浚发表救灾‘ 剿共 ’谈话,声称“ 救灾与剿共同时进行 ”。

5 月 20 日　　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

5 月 24 日　　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为豫鄂皖 3 省‘ 剿匪 ’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对‘ 剿匪 ’加紧进行部署,准备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 围剿 ”。其基本部署分两个阶段,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然后再转向对中央苏区进攻。

5 月 28 日　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表通电,声称‘ 救国必先剿共 ”,对于共产党‘ 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 ”。

5 月　　谢子长到兰州,经杜斌丞 介绍和邓宝珊（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在兰州城外五泉山会晤，双方对如何抵制蒋介石瓦解异己和联合抗日等问题，谈得很投契。

6 月 5 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通报了国民党当局第四次‘ 围剿 ’苏区的兵力部署,并对各地红军反‘ 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